

■ 朱艳林 曾瑞炎

近十年来私塾研究述略

近十年来,史学界关于私塾研究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十余篇。其在如何给私塾定位、私塾改良及其影响、私塾长期存在的原因、塾师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一、关于私塾的定位

对私塾,过去一般给扣上“死记硬背”、“鞭答体罚”、“脱离实际”、“教授八股文章”

等帽子,否认其传统作用及现代价值。而近十年来的研究,则多肯定私塾在传统教育中的作用,认为私塾作为传统教育的一种形式,在乡村广泛存在了几千年,在传统教育中起了重要作

“永陵博物馆”)研究部主任、1989年被评为文博专业副研究馆员的秦方瑜君,是一位多年埋首于文物考古工作默默耕耘的有心人和有志者。他充分利用了自己在永陵工作的有利条件,动用了自己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刻苦攻读、由名师指点获得的专业知识,细心观察,深入思考,遍寻资料,反复研究,并多方向专家请教,于1994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研究永陵的专著《王建墓之谜》。这亦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地研究永陵的学术著作。

《王建墓之谜》新见迭出,出版后好评如潮,一批享有盛名的学者,如缪钺、钟树梁、卞孝萱、吴丈蜀、郑学檬、王家祐、李绍明、康振黄、秦学圣、沈仲常、隗瀛涛、林向等,纷纷写信、题词,盛赞该书“详明精确的论证,解答了石刻乐伎之谜,可谓考古学与音乐史中的一个创新的贡献。”(摘自先师缪钺教授给秦方瑜的信)

秦方瑜君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学人。他目前已经从工作过近二十年的永陵博物馆退休了,已经不存在评职称或晋级之类的问题了,完全可以赋闲在家含饴弄孙。已出版的《王建墓之谜》,在考古学界颇具影响,他在学术界已享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原有的研究水平上,没有故步自封。就在《王建墓之谜》出版后的一片赞扬声中,方瑜君又深入到永陵墓穴,又钻进了故纸堆中,用了六年多时间,对他本已十分熟悉的永陵墓葬的方方面面作了进一步的钻研,终于在已经取得的学

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了这部更为扎实、厚重的《神奇的永陵》,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方瑜君是我在四川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同窗好友,五年的大学生活中我们长期共居一室。我大学毕业分去北京,在京工作二十余年后又回到成都。我现在供职的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我所服务的诸多名流耆宿,亦是方瑜君和我共同的良师益友。因此,近年来我与方瑜君的交往更加密切。谬承老友信赖,我有幸成为方瑜君的这部新著的最早的读者。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在《神奇的永陵》中,方瑜君征引的资料相当广博,既有大量的古代典籍,又有不少的今人论著,还有一些海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多达一百三十余种。

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方瑜君对永陵墓葬结构及墓内的石人坐像的考证,独辟蹊径,很显功力。他认定“现在发掘出来的被人称为是王建墓室”的地方,其实是王建的继位人王衍为父皇修筑的“祭坛”。作者断言王建的遗体仍深埋在地下,真正的“墓室”至今尚未被发掘出来。祭坛后面的那座石像,有多种理由认为并非王建本人,而是其子后主王衍,是王衍为诋“忠”、“孝”之名,自刻成像(见题图),埋于墓中,以示以身殉父的故意之作。方瑜君是在广征博引和细心考证的基础上得出这些独到见解的,持论有据,推理颇有说服力。我和许多从事史学工作的同仁一样,希望未来的文物发掘,会证实方瑜君今天的推断。

作者单位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



用。(参见闻洁《塾师经济待遇初探》《教育与经济》2002年第3期)尤其在乡村,中国私塾历史相对久远,对于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形式和价值观念在农村地区的推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参见王铭铭《教育空间的现代性与民间观念——闽台三村初等教育的历史轨迹》《王铭铭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新式学校教育得到发展后,私塾受到较大打击,但蒙馆性质的私塾仍十分活跃。其在传授基本文化知识,甚至是扫盲破蒙中,仍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参见熊贤君《如何正确评价私塾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年第1期)

私塾的教学方法是否科学,研究者认识不一。有的认为私塾教育方法有其现代价值:因为私塾寓道德于教学进程之中,有既定程序的书法教学方法,而且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体现了因材施教,作文教学也颇具特色。(参见熊贤君《私塾教学方法的现代价值》《课程、教材、教法》1999年9月《如何正确评价私塾问题》)。有的则认为私塾教法,特别是语文教学不科学。这是因为私塾没有一定的教材和学习方法,语文教学就是教学的全部内容,而且施教者的资格、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无一不是科学的。(参见李长清《私塾语文教学并不科学》《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第7期)

二、私塾改良及其影响

研究者认为,私塾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教育形式。步入近代以后,由于时局变化,私塾教育所提供的教育范围、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方向等日益背离了社会的需求。(参见刘招成《私塾教育的现代化转换:清末私塾教育改革》《集美大学教育学报》2000年第4期)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私塾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突变,政府也改变了任由私塾自行发展的历史传统,在筹划和推行义务教育的同时,一直在解决私塾的现代化整改问题。(参见张彬、秦玉清《近代浙江的私塾改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3期)

在传统上,私塾的设立是极自由的,但改良后,私塾的设立必须向政府呈报,不符合政府要求的私塾被取缔,私塾教学和课程亦标准化。这实际上剥夺了人们自由办学的权利,在思想上有利于政府将官方意识形态向基层和习惯上为公共空间的领域

渗透。(参见柳琴、左松涛《略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私塾改良》《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通过改良,私塾被纳入劝学所的指导范围,数量大为减少,私塾教育亦走上规范化、现代化的道路。与此同时,社会心理和塾师的思想也发生急剧的变化。这在有利于义务教育普及的同时,也减轻了政府办学的经济压力。(参见刘招成《私塾教育的现代化转换:清末私塾教育改革》等)此外,私塾的改良使私塾在新教育兴起后得以继续存在,从而导致中国近代整个社会教育体系呈现新旧二元并存的结构。(参见贾国静《私塾与学堂:清末民初教育的二元结构》)。

三、私塾长期存在的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过程不能看作是以西方科学知识为主的教育取代传统儒家教育的过程,即一个外来文明取代和征服地方的文化过程;而应看成是一个传统与近代互动的过程,一个妥协与创造并存的过程。(参见丛小平:《社区学校与基层社会组织的重建——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与乡村师范》《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11月号总第8期)因为传统和现代是不能割裂的。在学校不能普及,学龄儿童入学率低的情况下,作为教育工具,私塾仍然有其生命力。(参见郑起东《近代华北教育的变迁》《光明日报》2003年8月19日)正是由于新旧两极之间的过渡地带相当广泛,新式教育不能骤然取旧式教育而代之,私塾也就在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

私塾的存在多在农村,而这一地区在近代始终都没有一个畅通无阻的管道,以至政府虽颁布了许多改良私塾的法令,但却难以彻底贯彻实行。(参见柳琴、左松涛《略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私塾改良》)加之旧中国战争不断,灾害频发,家长为了保障孩子安全,而选择把孩子送入私塾。(参见唐秀平《论民国时期江苏私塾教育》《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0期)

中国农村经济是小农生产,需求大量的劳动力,而子女在私塾读书则比较方便。(参见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73年)而且同新式教育相比,私塾收费低廉而灵活,杂费亦较学校为



道教的法术——啸

重庆 胥洪泉

“啸”《说文解字》云：“吹声也，从口肃声。”《诗经·召南·江有汜》第三章：“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郑玄《笺》云：“啸，蹙口而出声也。”许慎说“啸”是用口吹出声音，重在注意发声的气流。郑玄说“啸”是撮口而发出声音，重在指出发声的嘴形。根据两人的解释可知“啸”，指撮口发出清越而悠长的声音。正如西晋成公绥《啸赋》所云：“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啸，其实就是今天的吹口哨。唐代孙广《啸旨序》云：“夫气激于喉而浊，谓之言；激于舌而清，谓之啸。”由于是吹出的声音，从音质上看，啸是一种“清”音。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啸的记载。就《诗经》

来说，除前引《江有汜》外，还有《小雅·白华》的“啸歌伤怀，念彼硕人”和《王风·中谷有蓷》的“有女仳离，条其啸矣”。“硕人”，身材高大的人，此指男子。“仳离”，别离，特指妇女被遗弃。诗中的主人公都是女性，或思念恋人，情意凄苦，或被遗弃，忧愁悲伤，就以“啸”抒发其抑郁忧伤的情怀。古籍中关于妇女善啸的记载不少。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仁智》谓鲁漆室女：当穆公时，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啸。旁人闻之，莫不为之惨者。”晋人崔豹的《古今注·音乐》载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无子，父兄为之改娶，妻闻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啸”。这些妇女都是用啸来抒发哀怨愁苦的感情。当然，用啸表达忧愁悲伤的情绪不只是女子，男子亦然。三

少，因此对于贫寒之家颇有吸引力。从“经济人”的角度看，入私塾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参见殷文《三十年代苏南农村私塾教育盛行的原因》、《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版，2004年第4期；贾国静《私塾与学堂：清末民初教育的二元结构》等）私塾存在的根本原因则是政府经费投入不足，改良私塾亦是近代中国经济不发达的环境下不得已的选择。（参见张帆、马红霞：《近代镇江私塾改良考》）

四、塾师及塾师文化

科举制废除后，塾师逐渐被排除于乡村教育领域。而中国寒士甚多，向赖以授徒为生计，因此他们在新式学堂兴起之际，为了避免失业，想方设法禁阻学生入学堂。（参见唐秀平《论民国时期江苏私塾教育》）此外他们

从自身利益出发，在改良私塾过程中敷衍塞责，拖延阻挠。（参见贾国静《私塾与学堂：清末民初教育的二元结构》）而且塾师这一群体，在近代由于新旧学的更替、时势的变化而得到填充。一些受新式教育者也从事私塾教育，甚至竟然也有师范学校出身者，舍小学而就私塾。（参见洪喜美《北伐前后私塾党化教育探讨》、《近代中国》第126期）。

塾师是封建时代一群命运不佳、仕途无望的没落文人。塾师之业纯属退而求其次的“导成”之业，因而也不是固定的身份。但塾师通过文化的世袭、师徒、姻眷、乡亲、宗党等关系，构成其特有的业缘、地缘、血缘相辅相成的社会关系网。（参见韩凝春《明清塾师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更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私学体制对私塾故事形态的影响，加之塾

师群体的双重人格和民间两种文化观念的撞击，导致对塾师评价的两极化。（纪军《谈民间故事中的塾师形象》、《高等函授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

新旧递嬗之际，许多近代国人不仅受过塾师教育的熏陶，亦经过新式教育的洗礼，因而塑造了既不同于完全旧式学人，也有别于新式学人的“他们”。私塾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塾师的人格虽为许多现代作家所不认同，但塾师文化却对他们的作文模式、文化品格和思想性格的形成都产生过影响。因此，他们在后来的自传和回忆录中，总不忘提及儿时或青年时代所受的私塾教育，言辞中也表现出对私塾的复杂心态。（潘先军《塾师文化与现代作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